

美国名校的日子不好过

经济不好,美国名校的日子也不好过。《名利场》8月号上,由财经记者妮娜·蒙克撰写的一篇专题报道,包括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和康奈尔在内,常春藤联盟的8所名校都陷入了窘迫的经济状况。美国私立大学靠的都是捐助,如今这些大学接受到的捐助金比往年平均下降近25%。至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学校哈佛大学,则正在经受其373年建校史上最糟糕、最危险的经济危机。在繁荣年代,没有人敢怀疑哈佛的财力,每个全职教授的基本工资就达19.2万美元,在美国高校中遥遥领先,给学生的奖学金则每年达3.38亿美元,这些数字加大了哈佛的光环。在刚刚过去的那个财政年度截至2008年6月30日,哈佛收到的捐助金尚有369亿美元。然而,新财政年的第一个季度,捐助金就剧减了22%(去年7-10月之间,哈佛比预计少收80亿美元捐助金)。一个巨大的赤字已经产生。妮娜·蒙克感叹,常春藤联盟的“镀金时代”已经落下帷幕。

哈佛大学向来出手阔绰,重金打造校园设施在所不惜,建一座花费2.6亿美元的新医学大楼眼睛也不眨一下,委托罗伦特·斯特恩设计一座巨型哈佛法学院副楼,也一点不成问题。然而如今,这所名校中已经弥漫起华尔街病恹恹的气氛。漫步在波士顿查尔斯河旁的哈佛校区,曾任捐助者约翰·哈佛的雕像闪耀着光芒,但其脚下几乎被挤爆的垃

圾箱却似乎透露出不妙的前景兆。至于哈佛最为雄心勃勃的宏伟项目——预计将在2011年竣工、造价超过12亿美元的科学综合大楼,目前已被迫停工。由于研究院的招聘与建设均已处于冻结状态,学生、老师、管理层之间的冲突正在酝酿之中。蒙克称,撰写这篇报道的过程中,哈佛官方拒绝与其合作,她成了“那个最不受欢迎的人”。然而,来自各方面的信息提供者却络绎不绝,似乎每个人都满腹牢骚,对“当权者”有话要说。许多人认为,目前奥巴马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前哈佛校长拉瑞·萨默斯难辞其咎。

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哈佛核心学院——文学和科学学院,如今面临2.2亿美元的财政预算赤字,这个数字,相当于文学和科学学院每年总预算的五分之一。在蒙克走访该学院的大礼堂时,学生会组织正在举行抗议,因为最无话语权的本科生毫无疑问将在头一轮裁员中成为最大的牺牲者。整个校园处于一片骚乱之中,教职人员很生气,学生们则感到被骗。工程及应用科学系教授史密斯叹息道:“在哈佛,控制成本一定是从本科生预算开始,而不是高层管理者的薪水。”

除此之外,一些基础设施也将降级。冬天空调的恒温器将从22℃降至20℃;学生以及教员从此以后都必须忘记免费咖啡这回事;学院与学院之间的免费班车车次将减少

一半;本科生部热气腾腾的早餐也将不复存在,冷冰水的火腿、芝士、谷物和水果将取代记忆中的培根、荷包蛋及华夫饼干。用哈佛大学校园报《哈佛克里姆森报》的话来说,“这里是哈佛最有钱的部门,如果连他们都不能供给咖啡了,那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免费咖啡事小,学生们真正担心的是教学资源条件的差异。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哈佛内部人员说,显而易见,哈佛即将爆发大规模裁员,课程将被精简,大班将取代小班,更少的教授、助教、警卫和后勤人员,谨慎发放的研究经费,自动贩卖机取代咖啡馆,初级的校体育代表队降级为俱乐部,没有加薪和奖金,以及校园里满目疮痍却无人清理的垃圾箱。

在哈佛的词典里,“成本控制”是个生词,他们更愿意称其为“调整”或“重新评估”。一位前哈佛高层管理人员说:“有人必须为当时的判断负责。”过去30年里,他们已经对大气惯了,1980-2000年的20年中,哈佛新辟了320万平方英尺的新校园,而2000-2008年,这个数字又翻了一倍,校园总面积直逼五角大楼。在这些新建址上,无数大楼被兴建起来,总造价超过43亿美元。

另一方面,从1990年的48亿美元捐助金,到2008年的369亿美元捐助金,那些哈佛的管理者满打满算地以为两位数的增长率将持续到永远。所以,哈佛从不开源节

流。《福布斯》披露,哈佛的不良资产率极高,光是没有资金准备的委托,例如私募基金,不动产投资或对冲基金就达到110亿美元。在现实生活中,如此理财早就被投资人炒鱿鱼了,但是一位哈佛商科教授说:“让哈佛控制预算,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哈佛不是生意,也绝不应该作为商业来控制成本。”没有一所学校有能力将费用快速地减下来,”一位对冲基金管理人员认为,“他们完全搞砸了。”虽然哈佛的资本运营者计划通过提高库存现金来增加学校的财务灵活性,比如之前试图以超低价出售其15亿美元的私募股权,以弥补捐助缺失结果无人问津。去年12月又变卖了25亿美元的债权,然而这些根本不足以弥补学校巨额固定成本支出的缺口。根据国际电子商情网提供的数据,哈佛的总负债额已累计至60亿美元,到2038年,哈佛每年所需还款的利息就达5.17亿美元。

虽然,新上任的哈佛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珍·门迪洛还在为哈佛的经济状况辩护,但地球人都知道,要不是走投无路,谁又会在去年12月的当口变卖家产呢?摘自《外滩画报》

小国伟人李光耀

样广受国际尊敬的领袖人物,还是非常值得尊崇的。

他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让我印象尤其深刻:其一,作为对西方文化有深刻理解的“亚洲价值观”的表述者,李光耀在捍卫新加坡发展模式的同时,突出了亚洲价值模式差异,成为东亚文化的政治旗手,同时也成为一代利用儒家思想改造现代社会的实践型政治家。其二,作为从冷战时期到新经济时代大国平衡游戏的杰出操作者,李光耀关于苏美平衡、东南亚与东亚平衡、两岸平衡、中印平衡的思考与实践可以说出神入化。他捍卫新加坡不同于美国的治理模式,但是又主张与美国保持在安全与经济领域的紧密合作关系,正是这种大国平衡游戏

玩得好,新加坡才谋取了最大化的发展资源。其三,作为专业精英机制与好人政治的主张者,李光耀创造了新加坡的举贤、养廉、培英、亲民机制。这一机制高度强调行政的作用,强调法律的严肃角色,而这些恰恰成就了新加坡长期而稳定的一党执政的政治现实。

同时,作为华族领袖,李光耀在新加坡政治制度设计中有意识地考虑到族群和谐的需要,平衡占主导地位的花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为少数民族提供突出的社会机会,从而有效地消除族群冲突。而在对中国的关系上,李光耀长期保持海峡两岸平衡,积极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在这种支持中积极谋取新加坡的利益,同时又寻求在全球其

他地区的平衡机会。

李光耀是个杰出的现实主义者,他不标榜太强的信条与价值观,而他的选择都是可变的,有所定见又多有通变才是他的政治治理的精华。难怪他跟邓小平先生那么谈得来,也难怪他那么欣赏中国领导人。相对而言,他对于那些有更强的意识形态信条的近几任台湾领导人的评价就谈不上有多好。

在李光耀身上,有一种超越一般领导人的洞察力和把实在的选择当成伟大信条坚持的勇气。恰恰是这样,李光耀所做的在我们一般人看来并不那么难,但是要学习到就很难。就像一篇政治时评说的那样,我们中国有了新加坡那么长时间,去的人觉得新加坡的经验比很多西方国家更可学,而回来后却发现至多学了点皮毛。

摘自《新周刊》

正准备在奥巴马攻击佩林时,以“伪君子”之名攻击奥巴马。但是,他们周密计划最终落空了,因为奥巴马的宽仁和诚实令他们无法回击!

虽然佩林从奥巴马的宽仁中走了出来,但是在整个选战过程中,贵为共和党副总统选人的她却始终无法以一种锐利的形象与民主党对抗,更没有用强大的力量攻击奥巴马,因为她始终笼罩在奥巴马的宽仁之中,直到人民用投票告诉全世界,他们选择了一位心胸博大满怀仁爱的黑人总统——奥巴马!

我们经常听到“对对手仁慈就是对自己残酷”这样一句话,然而真正高尚仁爱的人,一如奥巴马,他勇于“降低”自己,施仁爱于对手,却往往能真正赢来别人的尊重。所以美国人民把他抬到了一个最高舞台,成就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我想,所谓的“仁者无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摘自《妇女》

人们最常见的感慨:相识遍天下,知己无一人。

什么叫做知己?要求不宜太高,一个人的心,原本是天下至寂寞的地方,不然的话,一位朋友,不会把“我所有的烦忧,只有耶稣知道”这两行字绣在枕头套上。

知己并不是专为阁

知己也有别的知己

下两肋插刀,随召随到,摆平天下一切事的动物。

知己也不过是血肉之躯,除去知己之外,他还有他的职业、家庭、杂务。

生活中日常琐事最

最折磨人及消耗时间,无需战争,瘟疫,失恋,知己可能也走不开,不便即时提供安慰,要体谅知己,才会有知己。

知己也有别的知己,知己不是星体,单围绕着一个太阳转。

知己不是附属品,马屁精,逢事均说好好好,好得不得了。

知己是价值观与人生观相似的益友,知己是有商有量有意见的良师,知己愿意伸出双手,但是我们决不乘机将他拖落水。

细想想,不是没有知己的。

摘自《情未了》

有中错状元,无起错花名。民间语文是最佳城市评论员,地标外号所表达的亲切感、调侃感与嘲讽感,对应的是一个城市予以市民的归属感、荒诞感与疏离感。

大裤衩与小蛮腰

黄俊杰

建筑的戏谑成为一种消解方式,或者说一种集体娱乐。

据说上海人给东方明珠的外号是“糖葫芦”,从上到下有“三个球”,去参观东方明珠,售票员不会问你:买几张票?而是问你:一只球,两只球,还是三只球?

福楼拜曾躲到埃菲尔铁塔内喝咖啡,因为只有这样才看不到铁塔的身影;闻名世界的埃菲尔铁塔自诞生起便遭遇市民对它外形的质疑,上海的东方明珠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重庆计划3年建27个万人广场,中国城市好折腾可见一斑。中国这个“拆”字到处可以看到,有人戏称,中国就是“拆”,是“CHIAN”。市民的诟病不会让巨型地标的建设停止——天津海信广场被戏称“巴比曼”(奥特曼),这个略带调侃的比喻,隐喻着中国不少城市奉行的逻辑:超级建筑亦是超级英雄,它可以拯救乏善可陈的城市。

地标要中规中矩,符合大部分人的审美,还是要有趣?中国的网民热衷拍摄各种夸张的“最牛建筑”,这些或与当地经济不协调,或造型尤其奇特的建筑,每次都吸引大量的眼球,形成一种快速的民间传播——90年代末各种建筑流派纷至沓来,增加了城市建筑的混乱度;网络时代的到来,又催生了民主建筑的呼声——这更像是一个永远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悖论。

名流故事

文商两茫茫

感新式教育缺乏一套新型而统一的教科书,就与蔡元培一起设计。两年后,《最新教科书》国文第一册出版,几个月内销售10余万册,成为全国各地学堂代替四书五经的唯一新式课本,也把只有一个石库门房子的商务印书馆推上了成功的楼梯。

20世纪20年代,张元济等中国出版人创造了一个迄今叹为观止的奇迹:上海一年的图书出版量,大于美国全年的图书出版量。

张元济一生所嗜唯

有图书,他在家门口挂了一个小木牌子,上写四字:“收买旧书。”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商务印书馆宝山路总厂被投掷6枚燃烧弹,工厂全部化为灰烬。日军还放火烧毁了张元济建造的远东最大的公共图书馆东方图书馆。据当时报纸记录,当时,浓烟遮蔽上海半空,纸灰飘飞10里之外,火熄炎后,纸灰没膝,五层大楼成了空壳,其状惨不忍睹。时年65岁的他痛不欲生,但很快振作起来,提出“一息

尚存,仍当力图恢复”。半年后,印刷工厂就恢复了正常生产。

“孤岛”时期,张元济拒绝与日本人和汪伪政府合作,生活窘迫之际,他宁可卖字为生。一次,两位日本学者来,他在对方名片背后写下八个字:“两国交战,不便密交。”

又一次,汪伪政府的浙江省长傅式说送来一幅画卷,请他题字,还附有11万元的支票。他退回支票,修书一封曰:“是君为浙省长,祸深甚深……以是未敢从命。”晚年,有后生问他:“你是文人,还是商人?”张元济面如枯色,不作一语。

摘自《跌荡一百年》

鼠疫与科学名人

信中没有任何道歉的字眼,显而易见,类似的差错在当时已经司空见惯。费尔马后来又活了13年,直到64岁时,染上另一种疾病去世。我们可以这样推测,由于仕途的顺利不必为生计担忧,以及对社交生活的适时回避,费尔马得以安心地从事业余数学研究,最终成为17世纪法国最有成就的数学家。

当鼠疫于1664年通过英吉利海峡上的轮渡再次抵达英伦时,危害达到了顶峰。据记载,1665年夏天的两个月间,仅伦敦死于鼠疫的人数就达到了5万,即使是乡村,有些地方活着的人都来不及埋葬死者。幸运的是,几个月后的一场大火(史称“伦敦大火”)烧毁了伦敦的大部分建筑,老鼠和跳蚤也销声匿迹,鼠疫流行随之平息。

这场大火无疑是一个奇迹,另一个奇迹降临在1642年(伽利略去世)的圣诞节,在英格兰偏僻的小村庄诞生了一个男孩,他的名字叫艾萨克·牛顿。

在他出生前两个月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母亲管理着丈夫留下来的农庄。两年以后,母亲改嫁到了邻村,小牛顿被交给祖母抚养。后来,他在低水平的乡村学校里接受教育,除了对机械设计的兴趣以外,没有显露出任何特殊的才华。可是,牛顿还是勉强考取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尽管他的欧几里德几何答卷有明显的缺陷。他在大学里继续默默无闻地学习,很少受到老师们的鼓励。有一次,他几乎要改变方向,从自然科学转向法律。幸好没有,他得到了继续深造的机会。

本来,牛顿可能和其他按部就班的研究生一样,在教授的指点下循序渐近。可是因为伦敦流行的那场可怕的鼠疫,剑桥大学放假了,并且一放就是两年。23岁的牛顿回到了自己的村庄伍尔斯托帕,那是在剑桥郡北面的林肯郡。牛顿在故乡安静地度过了1665年(费尔马去世)和1666年,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独立思考。牛

顿开始了数学、力学和光学上的一系列伟大发现,他获得了解决微积分问题的一般方法,观察到太阳光的光谱分解,并提出了力学上的重要定律。假如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的描述正确的话,牛顿是在自己农庄的果园里,看见一只苹果坠落时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多年以后,牛顿故乡的一棵苹果树被移植到剑桥三一学院的门外,供游人瞻仰。

在牛顿的同母异父妹妹的遗嘱保存下来的一份牛顿手稿里,有这样一段描述:“……这一切都是在1665与1666两个瘟疫年份发生的事,在那些日子里,我正处于创造的旺盛时期,我对于数学和哲学,比以往任何年代都更为用心。”

两年以后,牛顿回到剑桥,顺利取得了硕士学位(那时硕士和博士的含义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不同国家的不同名称而已),并被选为三一学院的研究员。又过了两年,他的导师巴罗主动让贤,年仅27岁的牛顿担任了著名的卢卡斯讲座教授。

摘自《新华日报》